

「歐洲安全」研究的理論基礎： 區域安全、國際關係、全球體系

甘 逸 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國與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做為國際關係學門當中安全研究重要項目之一的「歐洲安全」，在經由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的理論辯證與政策實踐進程，已成為相關領域的重要範例。本文將有系統的以區域安全、國際關係、全球體系三個不同層次面向理論當中各自所屬的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做為理論架構，檢驗歐洲安全分別在冷戰與後冷戰時期的發展，以了解各理論的解釋效度與適用性。由本研究對於歐洲安全的交叉檢驗可以發現，冷戰時期以權力為安全關係核心，形成了長期區域集團對抗的國際雙極體系，因此，上述三個層次的理論當中的理性主義，對於此時期的歐洲安全發展較具解釋力；而各理論中的非理性因素對於後冷戰時期區域秩序的重建、共享觀念與價值的建構、以軟實力做為規範傳播工具，提供更為有效的解釋。總之，歐洲在安全政策的合作與統合進程，為理論的辯證與檢驗，提供了多元選項與適用範例。

關鍵詞：歐洲安全、區域安全、國際關係理論、全球體系、歐洲統合

* * *

壹、前 言

在歐洲區域合作的長期發展歷程當中，相較於其他的政策，屬於傳統「高階政治 (high politics)」面向的安全與防衛政策呈現兩個特殊的發展方向，一是在機制上的「分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與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EU) 就歐洲的安全議題有其競合關係，兩者在此一議題上的主導角色、關切範圍、發展進程、對外連結各有差異，也因此豐富了歐洲安全的意涵，使得

歐洲安全的相關研究更具多元性；^①二是在歐洲內部的統合進程中，安全政策的合作較其他政策緩慢，始自冷戰開始以降的歐洲安全合作，具有外部性的因素，冷戰的結束則提升歐洲自身推動安全合作的機會，因而賦予歐洲安全新的意義。因此，「歐洲安全」做為安全研究的一部分，其相關理論建構的發展也較為晚近，但不同理論與實務的累積已提升了此一研究領域的內涵，使得歐洲安全研究與相關理論得以相互補充與強化。^②本文即試圖運用相關領域發展出的理論，針對實際案例加以檢驗，以期對於歐洲安全合作動態進程的研究有所助益。

本文將系統化地探究歐洲安全研究的相關理論基礎，並特別專注在區域安全、國際關係與全球體系三個層次面向。首先，區域安全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相鄰近國家之間「友善 vs. 敵對」模式的相關安全關係，但何謂「區域」則是爭論的焦點，區域可區分為實體與功能的不同類別。傳統區域安全研究著重地緣戰略中主權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強調地理的遠近決定了安全威脅的傳播能量與速度；晚近的研究則聚焦於「想像」的或「認知」的區域，而非「實體」的地域。^③其次，在國際關係層次上，學界在歐洲安全的理論建構，相較於整體歐洲統合的論述，可說是相對緩慢的。^④以兩極體系安全政策思維為基礎的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冷戰驟然結束所導致的國際單極秩序，仍處於適應階段；歐洲於後冷戰時期在相關機制、政策內涵、任務行動與安全戰略方面所進行快速整合，傳統的思維亦未能處理如此高度的變遷；另外，相關的研究過於專注在政策實踐的層面，而忽略歐洲安全合作在理論層面的解釋。^⑤對於以上的這些缺失，必須以主流的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完整理論架構加以補充。最後，全球體系是一個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的場域，通常以單

註① 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前身為歐安會議 CSCE），是另一個有關歐洲安全的機制。歐安會議在冷戰期間成形，逐漸演變為一個冷戰雙方對話的平台，並且在冷戰結束之後被視為西方藉以將原社會主義國家加以「社會化」的能動體。然而，相較於歐盟與北約，歐安組織得以使用獎賞與懲罰做為工具而發揮社會化影響力的能力，卻相對有限。原因之一是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並未將其與上述兩大機制等量齊觀，歐安組織至多發揮說服的功能；另一原因則是歐安組織的建立與發展，自始即缺乏條約基礎，歐安會議的存在是建築在各方政治的協商過程上。Michael Merlingen and Rasa Ostrauskaitv, "The OSCE: The Somewhat Different Socializing Agency," in Trine Flockhart ed., *Socializing Democratic Norm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127~146; Peter van Ham, "Security and Culture, or, Why NATO Won't Last," *Security Dialogue*, Vol. 32, No. 4 (December 2001), pp. 393~406.

註② Ulrich Krotz and Richard Mah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Rise of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63, No. 3 (July 2011), pp. 548~579.

註③ Raimo Väyrynen, "Regionalism: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March 2003), pp. 37~39.

註④ Xymena Kurowska, "Introduction: The Role of Theory in Research on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in Xymena Kurowska and Fabian Breuer eds., *Explaining the EU's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Theory in A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1~15.

註⑤ Tuomas Forsberg, "Integration Theories, Theory Development and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Johns Hopkins*, <http://www.jhubc.it/ecpr-porto/virtualpaperroom/137.pdf>. Accessed on April 16, 2015.

極、雙極與多極體系呈現。^⑥在後冷戰時期全球各強權的實力建構過程當中，歐洲在區域安全上的統合，增加了以美國為主國際單極體系的複雜性，^⑦並對未來全球權力體系帶來深遠的影響。

綜合而言，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將上述三個層次面向的理論，做為對歐洲安全分別在冷戰期間與後冷戰期間發展的檢驗基礎，以系統性的探究各理論的解釋效度與適用性。在理論方面，此三個有關歐洲安全的理論各自有所屬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部分。從理性主義角度而言，行為者深受物質決定因素對行為的影響，並受到結構與機制延續性與穩定性的制約，並因傾向以權力與利益極大化做為目標而容易產生單元間競爭的態勢；相對地，非理性主義強調，行為者重視價值與認同的建構與共享，經由不斷社會化的過程，使得結構與機制亦必須轉化以適應新局，單元之間也習慣藉由合作關係以提升集體的利益。在實踐案例方面，本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歐洲安全」，在安全研究領域當中，歐洲安全經過長期的發展，已經成為重要的次領域。

然而，歐洲安全逐漸演變為一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因而多數相關的研究，均未清楚界定「歐洲安全」的定義，但是相關的論述均與在歐洲地區產生或是歐洲國家之間所進行在安全政策的合作或統合相連結。^⑧基本上，當代歐洲安全研究著重在冷戰開始後的歐洲，尤其是從西歐的角度出發，而美國所主導的跨大西洋關係是影響歐洲安全的重要外部因素，因而對於歐洲安全的走向也在大西洋主義與歐洲主義兩者之間擺盪，北約與歐盟就成為有關歐洲安全發展的最重要機制。^⑨總體而言，本文期經由三個層次理論當中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對於歐洲安全在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的交叉檢視，並以北約與歐盟為主要研究之機制，以期歸納出各層次理論對於實際案例解釋適用性的比較分析，並對歐洲安全的理論與實踐相互檢驗的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貳、區域安全研究的演變

一、理性主義的區域安全

區域安全研究的對象主要聚焦於存在於相鄰近國家之間的關係，由於歷史長期累積的互動模式，國家之間的互動處於「友善 vs. 敵對」兩個極端的光譜之中，形成了區

註⑥ 陳欣之，「單極體系的形成、維繫與轉換」，*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2 期（2006 年 4 月），頁 111~140。

註⑦ 有關美國的全球主導性，參見 Barry R. Posen,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1 (Summer 2003), pp. 5~46.

註⑧ Ole Waever, "European Secu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No. 1 (March 1996), pp. 120~125.

註⑨ Adrian Hyde-Pric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Use of Forc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3, No. 4 (January 2004), pp. 323~343; Mark Webber, Stuart Croft, Jolyon Howorth, Terry Terriff and Elke Krahnmann, "The Governance of European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1 (January 2004), pp. 3~26.

域與區域之間不同的安全特色，亦即所謂的「區域安全複合體」。區域的特色特別容易受到安全的功能性所凸顯，在全球體系下屬於次體系的區域，形成「安全化（securitization）」與「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模式的連結關係。^⑩亦即在一個區域內國家之間形成的安全化與去安全化過程，影響區域安全複合體的內涵。所謂安全化，指的是在一個政治社群內，單位行為者將外來威脅視為一相關重要的客體，並產生必須處理威脅的緊急例外措施需求，因而所建立互為主體理解（intersubjectivity，交叉主觀或譯為相互主觀）的一個論述性過程。相對地，所謂去安全化，意味著政治社群內緩和或終止將某事務視為相關重要客體的外來威脅，因而暫停或終止緊急例外處理威脅的措施。由如此的關係所建構的區域安全複合體，彼此存有高度互賴的安全關係，因而形成區域的安全關係特色。

除了地理鄰近的因素之外，另一個影響區域安全複合體成因的要素是「安全外部性」。區域外具有關鍵軍力投射能力的國家或聯盟，雖然其領土的地理位置不位於該區域內，但其投射力足以決定此區域安全的發展，例如冷戰期間的美蘇兩大強權。^⑪從此一角度視之，區域的安全外部性影響相關國家的安全關係，區域中的地理因素並不一定是「命定」的，而是一個得以經過形塑的過程。因此，區域的「邊界」並非必須是天然的物質條件，也可能是受制於安全關係所能影響的範圍。受到安全外部性影響的區域安全，其本質是經常變動的，因為可能受到科技的發展、國力的消長、領導人的更替等高度動態因素，而影響到區域外國家之投射能力的變化，因而決定了區域安全的「邊界」與本質。

為了延展傳統區域安全的解釋性，地理因素應具有開放性，安全外部性則適時扮演開放性的角色。隨著安全環境的變遷，例如衝突狀況的發生或消弭，安全外部性可能使得區域邊界向內縮減或向外延伸。至於影響區域內國家與區域外部強權關係的主要因素，則是兩者的利益是否過於分歧，當強權認知到其在該區域的利益受到威脅時，較容易採取干涉的策略。然而，在一個單極的國際秩序當中，唯一超強對於區域安全會採取干涉的可能性反而會降低。^⑫區域安全在物質環境與安全外部性的兼顧，說明了區域安全研究應具有高度動態的有機性，而非僅關注靜態的結構。從動態與靜態兩面向加以檢視全球各地區，歐洲的區域安全相當突出，因為歐洲同時具有此兩者的特色，一方面地緣戰略因素在歐洲安全議題上一向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歐洲又同時深受來自東西方的區域外部化力量所影響。^⑬

註⑩ 「安全化」指的是將通常性的政治運作脫離原有的規則，可視為「政治化（politicization）」的極端形式。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8, 43.

註⑪ David A. Lake,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 Systems Approach,"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9-51.

註⑫ Douglas Lemke,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2.

註⑬ 有關歐洲統合受到地緣戰略因素的影響，見吳雪鳳，「歐洲統合的地緣政治意涵」，*問題與研究*，第51卷第3期（2012年9月），頁55-86。

二、批判主義的區域安全

有別於上述地理空間與外部化的理性主義之探討，批判主義的區域安全研究提倡動態的安全「區域化 (regionalization)」，著重在區域凝聚與認同的建構，藉此凸顯衝突解決與防制全球威脅的重要性。^⑭批判主義強調藉由國家及非國家角色在特定國際建制內所形成的戰略合作，包括各種秩序重建的計畫，以形成一個區域的治理架構。^⑮在地理位置上較為接近的角色，容易形成區域的集體認同，進而組成區域組織並進一步演變成區域安全共同體。因此，批判主義的區域安全論特意彰顯區域安全的夥伴關係，著重在區域的統合進程，並賦予區域內部角色更多有關衝突管理的責任，相對減少區域外部化的角色，使得區域組織不再單純是強權發揮影響力的工具。從批判主義的角度觀之，安全面向的區域主義超越了理性主義的描述性分析，開始具有高度規範性的特徵，區域主義被視為具有進步精神的價值。

批判主義區域安全特別排斥區域外部化因素，尤其是容易使區域主義受到負面影響的霸權區域主義 (hegemonic regionalism)。依照此一主義，霸權藉由區域做為發揮其投射能力的平台，對於霸權而言，地區並非內生的，而是霸權運作下「由上而下」的產物；區域也非分析的層次，而是具有主導性的國家在全球層次所使用的工具。因此，區域並非內部成員或區域建制所產生的互動結果，更非以想像或認同為基礎的共同體。^⑯相對而言，批判主義認為區域主義的發展應抗拒霸權區域主義所主張的易滲透性，例如美國所主導單極安全體系的壓力，以便建立具自主性的區域主義。^⑰在全球各區域當中，最足以凸顯批判主義特色的區域安全，應屬歐洲地區，因為歐洲最有能力抵制單極體系，也最易呈現區域的多極秩序。因此，批判主義主張未來的全球秩序是介於一個以歐洲為參考模式、後西伐利亞式的區域主義，以及以美國為主導、新西伐利亞式的區域主義兩者之間的競爭。^⑱對於批判主義者而言，從以美國霸權為主導的國際單極體系回歸到多極體系，不只是一個戰略的需求，甚且是具有高度規範意涵的趨向。

註⑭ Mary Farrell, "The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An Introduction,"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8.

註⑮ Louise Fawcett, "Regionalism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24.

註⑯ Amitav Acharya, "Regional Military-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Relevance and Limitations of ASEA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9, No. 1 (February 1992), pp. 7~21.

註⑰ 有關霸權區域主義，參看 Peter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註⑱ Björn Hettne,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285.

三、區域安全研究的適用性

綜合而言，後冷戰時期區域安全研究的論述呈現蓬勃發展的氣象。強調科學與價值中立的理性主義傾向將區域視為明確與正式的分析層次；相對地，非理性主義則強調區域在處理衝突與威脅方面的功能性，著重在區域做為一個計畫或政策，而非研究架構。雖然兩者的理論基礎有所差異，但其論述則有相互補充的作用。綜合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論述，可以將區域安全的屬性歸納為三項：第一是開放性，區域雖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並不一定具有明顯的地理邊界，且經常容易為外部角色所滲透。第二是地理鄰近的因素，相互接壤的國家容易產生更緊密的安全關係，但問題是所謂的「區域」範圍究竟為何，則並無定論。第三是弱勢國家的操作空間，這類型的角色較強調藉由區域統合的方式，以集結區域的集體力量，做為對應安全外部性的反制，以減少區域內的安全困境。

冷戰格局的全球雙極體系阻礙了區域安全的自主性，冷戰的結束則提供了區域主義大幅發展的可能性。^⑩環視全球各區域在後冷戰時期的安全環境演進，歐洲區域安全的變化最為顯著。冷戰的特色是兩個相對立的集團，雙方具有排他的會員組合與利益範圍；冷戰的結束瓦解了區域的雙極秩序，原屬不同陣營的雙方在尋求建立新的秩序當中，以合作與融合的方式，擴大了西方原有機制的功能與範圍。因此，冷戰結束後歐洲區域安全最重要特徵即是摒棄了冷戰期間的機制「排他性 (exclusiveness)」，而朝向「包容性 (inclusiveness)」發展，擴大了區域的地理範圍。

在歐洲安全的機制當中，北約組織扮演關鍵的角色。在後冷戰初期，北約續存問題受到相當的質疑，但北約不但持續擴張，更在 911 恐怖攻擊後，第一次啟動大西洋憲章第 5 條「集體防衛」的規範，高度象徵此一區域安全機制的團結。^⑪為了因應新的安全環境，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展開「轉換 (transformation)」的過程，依照「戰略概念 (Strategic Concept)」文件，北約將同盟的主旨從領土的防衛，轉移到更為廣泛的安全方式與任務，包括境外維和任務、危機處理，甚至新安全威脅。機制間也展開了相互間的關係，產生了競合的互動，包括北約、歐盟、西歐聯盟 (Western European Union, WEU) 與歐洲安全合作組織等，^⑫其中尤其以北約與歐盟的合作最為重要，已成為歐洲安全的主導力量。

從冷戰結束以後有關歐洲安全所進行的任務來看，多元角色的合作與分工已成為常態。同時，冷戰期間由西方創立與主導的機制也漸次向前敵對國家陣營擴張，所處理的任務亦漸趨多元化。透過冷戰剛結束的探索階段，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北約與歐盟便以幾乎平行的方式進行擴張，此攸關歐洲安全的兩大機制，不只是以傳統的會

註⑩ Robert E. Kelly, "Security Theory in the 'New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9, No. 2 (Summer 2007), pp. 223-225.

註⑪ Philip Gordon, "NATO after 11 September," *Survival*, Vol. 43, No. 4 (Winter 2001-2002), p. 5.

註⑫ 吳萬寶，「維持和平：歐安組織與北約的競爭抑或分工？」，*研究與動態*，第 14 期（2006 年 7 月），頁 59-88。

員資格身分加以擴大，且著重在其他形式的結合關係。^②然而，包容性的特色仍須依照某些標準以做為規範，例如地理上的界線，但儘管是如此相對清晰的概念，都未必容易將相關的國家劃分為歐洲或非歐洲的類別。例如，接近高加索地區與中亞地區的國家雖有意加入歐洲區域安全，但這些個案仍有相當的模糊空間。另外一個更為模糊的分類是建立在觀念上的，歐洲的普世價值是彰顯區域安全「包容性」的重要特徵，包含民主、法治、自由經濟、文人領軍、政府官僚的專業化等，都對有意加入北約與歐盟的國家，提供了一套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但在實際的實踐上仍有模糊空間。

為了實現歐洲區域安全在後冷戰時期的「包容性」，歐洲安全向「歐洲化 (Europeanization)」發展是一個必然的趨勢，^③亦即以專屬歐洲的區域層次做為架構，以發展出區域的安全政策。從冷戰結束之初，由於美國期待歐洲分擔歐洲防衛的重任，因此美歐進行不同面向的分工，一是在北約內部設立專屬歐洲的支柱，稱為「歐洲安全與防衛認同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se Identity, ESDI)」，另一是建立北約與歐盟的連結，稱為「柏林附加協定 (Berlin Plus Agreement)」，其目的都在為因應冷戰結束後的高度變遷局面，強化歐洲在安全政策的角色。此種聚焦於軍事面向的技術性安排，給予歐洲國家在處理非由北約主導的任務時，得以使用北約資產與能力的機會。^④然而，事實的演變出乎西方的預期，雖然冷戰的結束終結東西的對峙，但是 1990 年代中期歐洲仍發生軍事衝突，冷戰結束後歐洲的安全安排無法處理新的變局，類似歐洲安全與防衛認同以及柏林附加協定等機制顯然已無法達到原先的目的。^⑤歐洲安全政策的「歐洲化」進展因而趨緩，且須等到英法這兩個軍事大國提出新的倡議，「歐洲化」的區域安全政策才獲得顯著的進步。直到進入到 21 世紀之初，歐洲國家才逐漸發展出自身的區域安全政策整合，強調在北約無意主導任務時，歐盟可建構相關決策與採取軍事行動的獨立能力。

歐洲區域安全「歐洲化」的重要象徵之一，是權力中心的分殊化與議題的多元化。在冷戰時期的北約架構下，決策程序傾向於垂直的官僚決策體系。但在後冷戰時期，歐洲的區域安全強調高度發展的制度化，以及以擴張與夥伴關係所進行的共同體的建立。除了傳統的軍事單位外，為了應對新的安全威脅與任務，更多非軍事政策的公私部門，例如司法、經濟、內政、軍事科技等領域官員、非政府與私人角色以及智

註② Mark Webber, Terry Terriff, Jolyon Howorth and Stuart Croft, "The Comm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nd the 'Third-Country' Issu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1, No. 2 (Summer 2002), pp. 75-100.

註③ 有關「歐洲化」的理論分析，見黃偉峰，「論歐洲化課題之各類研究取向及其限制」，*歐美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頁 393-463。

註④ 美國在冷戰結束後開始認知到，歐洲必須對發生在歐洲地區的安全事務，負擔更大的責任，因此在 1994 年 1 月北約布魯塞爾高峰會提出「歐洲安全與防衛認同」，在北約架構內設立歐洲支柱，當美國無意介入某些軍事衝突時，改由歐洲來主導。之後，北約又於 1999 年 4 月華盛頓高峰會時，提出「柏林附加協定」，明確界定由歐盟所領導的危機處理任務可使用北約的資產與能力，包括通訊、後勤支援與政策規畫，該協定在 2002 年 12 月由北約與歐盟正式簽訂。

註⑤ Elizabeth Pond, "Kosovo: Catalyst for Europ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2, No. 4 (Autumn 1999), pp. 77-92.

庫學者等，都成了區域安全的積極參與者。另外，由於後冷戰時期衝突本質以及威脅形式的快速變遷，帶來歐洲安全範疇的廣泛性，安全議題因而更加多元化。^⑥藉由如此的分殊化與多元化，歐洲於最為平和且無明顯外在威脅的後冷戰時期，卻致力於軍事安全政策的整合與集體軍力的提升，顯然並非因為傳統權力均衡的考量，而是具有高度象徵意涵的統合作為。

事實上，歐盟安全政策在整合之初，能否有效解決區域衝突與危機，是一個廣被質疑的問題。批評者認為歐盟在安全政策的整合，只是象徵性的作為，但缺乏實質內容。^⑦對於歐盟所提的軍事政策架構，批評者甚至將歐洲的集體軍力貶抑為「紙上軍隊」，其戰場只限於歐盟總部的電腦。^⑧長期以來歐洲國家領袖缺乏運用軍事資產的政治意願與機制，且歐洲各國在戰略文化、意圖、價值與文化各方面，存有極大差異，因此歐洲的安全政策合作將面臨限制。^⑨然而，歐盟在共同安全政策的架構下，於世紀交替之際，建立了更具軍事意涵的機制，制定了歐盟專屬的安全戰略，協調各會員國的軍事採購計畫，設定了建立歐盟專屬部隊的長期方案，發展出具軍事意涵的太空計畫與衛星導航系統，更以具體行動進行了一連串的境外維和任務，以彰顯歐盟加強集體軍事與危機處理的能力，以及擔負歐洲以外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意願。^⑩歐盟的集體軍事實力經常被忽略，因為歐盟與第一強權美國之間的軍力仍相差甚遠，且歐盟甚少被視為一個整體的軍事強權。然而，環視全球的現況，歐盟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軍事強權，年度國防預算是美國的四成，投入在軍事研發的預算約為美國的三分之一，做為歐盟會員國當中最大的兩國軍事大國，英國與法國兩個核武國家更是美國以外最具全球軍事投射能力的國家。^⑪歐盟經由條約化與制度化的過程，不斷賦予歐盟的對外安全政策新的意涵，並將聯盟的共同利益予以清楚地界定，使得歐盟的安全政策較以往更為整合。^⑫

歐洲國家形成在區域安全整合的共識，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結果。首先，如果美國與歐洲缺乏在後冷戰時期北大西洋安全的共識，北約與歐盟則無法就雙方的任務合作有所進展；其次，歐洲大國在傳統上具有安全政策的歧見，對歐洲安全也存有利益的

註⑥ Carmen Gebhard and Per Martin Norheim-Martinsen, "Making Sense of EU Comprehensive Security Towards 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Clarity," *European Security*, Vol. 20, No. 2 (June 2011), pp. 221~241.

註⑦ Alistair J. K. Shepherd,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 Policy without Substanc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2, No. 1 (Spring 2003), pp. 39~63.

註⑧ Robert Wilkie, "Fortress Europe: European Defense and the Future of the North Atlantic Alliance," *Parameters*, Vol. 32, No. 4 (Winter 2002-2003), pp. 34~47.

註⑨ Peter van Ham, "The Prospects for a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Identity," *European Security*, Vol. 4, No. 4 (Winter 1995), pp. 523~545.

註⑩ 何泰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之研究：以2003年剛果軍事任務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6卷第4期（2005年10月），頁185~238。

註⑪ SIPRI, *SIPRI Yearbook 2010: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註⑫ Charles Grant, "Is Europe Doomed to Fail as a Power?,"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www.cer.org.uk/pdf/essay_905.pdf. Accessed on April 8, 2015.

差異，但後冷戰時期主要國家得以在不斷的政策修正上縮減歧見；另外，由於歐洲在後冷戰時期軍力持續萎縮，不但無法持續做為北大西洋聯盟的堅強支柱，反而可能成為負擔，因此歐洲進行軍事政策的整合，更重要的是在「集體」軍事力量的建構。³³相較於冷戰期間歐洲對自身安全缺乏主導性，歐盟在後冷戰時期安全政策的發展，無論是在機制的參與上，或是集體軍事能力的建構上，均有明顯的進展。歐盟在共同安全政策的重心是衝突的預防，軍事與非軍事力量的共同使用強化了歐盟安全政策的可信度。³⁴後冷戰時期歐洲在區域安全的持續發展，非但未因冷戰的終結而弱化，反而因為面對安全環境的改變，以及新安全威脅的興起，使得歐洲區域安全得以重新修正、建構與強化。

參、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適用性

一、現實主義

討論國際關係的理論架構，無可避免地必須從現實主義開始。做為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學派，現實主義是檢驗歐洲安全所發生巨大變化的重要理論架構。對於一個新興的國際單極體系而言，現實主義所關注的是「平衡」勢力是否成形，以及是否將形成對全球超強的挑戰。依照對象與形成方式，可將平衡關係區分成「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與「威脅平衡 (balance of threat)」。主張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促使各國家將自我的安全與生存視為核心利益。³⁵國際社會的本質是競爭的形式，由於缺乏高於主權國家層級之上，且得以防止國家採取侵犯他國主權行為的更高權威，因此國家重視的是相對權力，各個國家均試圖擴大安全與生存的機會，而強化自身的軍事實力便成為最有效的手段。當某個國家大幅增強其實力，或被相關國家認為其實力大增，則這些國家將會採取相應的措施。特別在面對超強時，較為弱勢的國家在應對一個如此實力過強的對手，而又深感威脅時，各國最常使用的方法便是權力平衡，以藉由內部強化自身實力的方式，或對外聯合同樣處於弱勢的國家形成聯盟，以對抗較為強勢的國家。³⁶相對於平衡手段，更為弱勢的國家並無力對超強進行平衡，因為其有限的的能力導致有限的選項，因此只能採取「扈從 (bandwagoning)」方式加入強權以改善其弱勢的地位。³⁷

註³³ Jolyon Howorth, "Britain, France and the European Defence Initiative," *Survival*, Vol. 42, No. 2 (Summer 2000), pp. 33~55.

註³⁴ Christopher Hill, "The EU's Capacity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6, No. 3 (Autumn 2001), pp. 315~333.

註³⁵ 所謂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客觀存在，也並非為國際關係學者完全接受，例如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Makes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註³⁶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ddison-Wesley, 1979), p. 168.

註³⁷ Eric J. Labs,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2 (Spring 1992), pp. 383~416.

從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冷戰時期的歐洲統合進程著眼於地緣戰略，個別歐洲國家無力單獨對抗以蘇聯為主共黨集團的威脅，中小型的西歐國家就以合作方式形成對蘇聯的權力平衡。³⁸而在冷戰結束之後，尤其當美國單邊主義日益明顯之際，歐盟又被視為最有可能對美國採取平衡措施的角色，擁有與美國優勢較小的差距。³⁹依照現實主義的預測，後冷戰時期的北約將隨著蘇聯瓦解，同時，歐洲也將試圖形成抗衡美國的聯盟。⁴⁰歐洲在各項政策統合後，已經發展成具全球實力的角色，為了與美國平起平坐，歐洲或需在軍事政策上進一步整合，以滿足歐洲地緣政治的企圖心。⁴¹總之，(結構)現實主義者認為，後冷戰時期新興的全球政治環境提供歐盟得以在安全與防衛政策進一步統合的契機。⁴²

然而，事實的發展卻與現實主義的預測相去甚遠。雖然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維持軍事獨強的地位，但是歐洲各國不但無意提升軍事能力，以形成對美國的平衡，而且仍持續投入在北約的安全架構，甚至在美國的主導下，北約向前敵對集團擴張，⁴³北約東擴改變了聯盟的特質，北約所需防衛的領土與所需承擔的責任明顯的擴大，也與傳統現實主義的主張有異。⁴⁴在 911 恐怖攻擊之後，北約的軍事行動甚至超越了歐洲的地理範圍，顯示歐洲仍有意在北約架構下，持續維護美國主導歐洲安全的共識。⁴⁵

對於歐洲並未在後冷戰時期形成對美國的平衡，現實主義者試圖對此種理論與現實的「落差」加以解釋。例如，歐洲國家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有所疑慮，但因為兩者在後冷戰時期的相對實力相差甚遠，歐洲「無法」形成足以制衡美國的實力。⁴⁶在一個單極國際體系當中，美國權力獨大，歐洲國家對於美國採行權力平衡將是不理性的行為，歐洲只能在美國無意介入歐洲事務時，進行集體軍力的強化，但這絕非有意對美

註³⁸ Sebastian Rosato, "Europe's Troubles: Power Politics and the State of the European Proj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Spring 2011), pp. 45~86.

註³⁹ William C. Wohl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04.

註⁴⁰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 p. 76.

註⁴¹ Charles A.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3), p. 151.

註⁴² Barry R. Posen,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Response to Unipola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2 (April-June 2006), pp. 149~186. 另外，有關結構現實主義對中東歐地區加入歐洲安全合作進程的解釋，見楊三億，「後冷戰時期中、東歐地區權力結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2 期（2002 年 3、4 月），頁 89~103。

註⁴³ Strobe Talbott, "From Prague to Baghdad: NATO at Risk,"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p. 46~57.

註⁴⁴ 依照現實主義的辯護，軍事安全具高度主權敏感性，歐洲國家無意發展出與美國抗衡的集體軍力。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22~345.

註⁴⁵ Kenneth N. Waltz, "NATO Expansion: A Realist's View," in Robert W. Rauscher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p. 32~33.

註⁴⁶ David Skidmore, "Understanding the Unilateralist Turn in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 No. 2 (July 2005), pp. 215~216.

國的平衡。^④此種現實主義的解釋是有其缺失的，因為依照權力平衡的理論，次級國家能否對應超強的獨霸而產生平衡，主要取決於是否認知到其威脅而有意採取平衡，而非有無能力進行均衡。另外，歐洲與美國在軍事架構與政策目標具有高度重疊性，歐洲的軍事安全又極為依賴美國，本身亦無意提升軍事政策資源的挹注，因此歐洲並未挑戰美國軍事獨強的地位。

相較於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論述，「柔性平衡 (soft balancing)」的提出或有助於補充現實主義的不足。柔性平衡從「非軍事」的層面出發，強調在國際機制內以外交及其他競爭的方式，形成對超強的制衡，^⑤但柔性平衡也可表現在軍事政策上。歐洲在冷戰結束後，在安全機制、軍事任務、武器系統與安全戰略上，都致力於合作程度的提高，以獨立於美國之外。歐盟於 1992 年之後創立了「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執行了人道救援與危機處理的境外軍事行動 (out-of-area operations)；成立「歐洲防衛局 (European Defence Agency, EDA)」專門負責會員國間軍事科技與軍備的合作；另外，為了凸顯歐盟全球角色的特殊性，並且展現在國際社會的政治企圖心，歐盟通過了第一份「歐洲安全戰略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ESS)」。^⑥藉由上述安全政策與行動的整合，歐盟試圖發展成具有集體軍事力量的角色。^⑦然而，柔性平衡畢竟不同於純粹以軍事政策為工具的「硬性平衡 (hard balancing)」，歐洲國家柔性平衡的目的不在於製造對抗美國的聯盟，而是為因應後冷戰時期局勢的反應，尤其是避免美國過度的單邊主義。當歐洲國家對美國全球安全政策不滿程度增高時，或許歐洲內部在防衛合作的政治意願亦隨之加強，^⑧但是並無明顯的證據可證實，歐盟有任何積極的作為以集體的力量來防堵美國的全球影響力。^⑨歐洲的目的仍是期望美國回到多邊主義的架構下，持續與歐洲在國際事務與機制的合作，繼續擔任區域安全的主導力量。然而，柔性平衡也可能對全球體系造成長期的影響，當歐洲與其他區域強權合作，便無法排除侵蝕美國的主導地位或減損美國採取單邊主義能力的可能性。^⑩

至於現實主義的威脅平衡理論則主張，當較為弱勢的國家認知到外在威脅時，包

註④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 91.

註⑤ Robert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註⑥ Sven Biscop, "Odd Couple or Dynamic Duo? The EU and Strategy in Times of Crisis,"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4, No. 3 (Fall 2009), pp. 367-384.

註⑦ Anders Wivel, "Balancing Against Threats or Bandwagoning with Power? Europe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1, No. 3 (September 2008), pp. 299-300.

註⑧ Michael H. Smith, "Taming the Elephan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American Power,"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6, No. 1 (January 2005), pp. 129-154.

註⑨ Jolyon Howorth and Anand Menon, "Still Not Pushing Back: Why the European Union Is No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3, No. 5 (October 2009), pp. 727-744.

註⑩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 for Soft Balancing," pp. 72-108.

括領土可能遭受侵犯，或是他國可能形成政治與軍事的掌控，可能將採取反制行動加以因應。^{⑤4}威脅平衡與權力平衡論述不同之處在於，後者強調相對實力消長在區域安全的重要性，但威脅平衡更重視的是權力如何被使用，以及權力集結的對抗對象，這些都是構成威脅計算的要素。^{⑤5}威脅的認知與評估是一個相當主觀認定的過程，當一個國家被認知為具有侵略性，潛在的受害者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安全，可能以獨力或結盟的方式，試圖減弱對方的實力，修正對方的威脅意圖，或是完全地去除對方的威脅力量。但是為應付威脅而以聯盟形式形成的平衡，反而可能引起相互猜疑的不斷升高，雙方難以獲致妥協，有時可能導致軍事衝突。^{⑤6}

依照威脅平衡的論述，歐洲在後冷戰時期的實力與美國相比呈現巨大差距，美國的實力足以採取單邊主義而毋庸擔心其他國家的反應，但其他國家卻無法確認美國是否將威脅到它們的利益。^{⑤7}雖然美國不至於造成對歐洲直接的利益威脅，但美國在國際重大事務採取的單邊主義，或在其他地區進行的單邊軍事行動，已足以影響到歐洲的利益。例如，在有關安全政策、氣候變遷、國際刑事法庭等議題上，美國針對不同意見者的激烈態度，引起歐洲普遍的反感，美國的全球反恐行動，更凸顯了美國對於歐洲盟邦的輕忽。^{⑤8}然而，歐洲國家並無形成對美國威脅平衡的意願與能力。雖然歐洲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但一方面美國的單邊行為仍屬於個別案例，另一方面歐美之間所共享的核心價值體系，包括自由民主、人權、市場經濟與法治，遠大於兩者間的差異。^{⑤9}就實務的運作與事實的發展而言，歐洲國家仍受限於歷史包袱與個別利益，在集體安全政策與實力建構的面向上，仍存有許多障礙。^{⑥0}歐盟主要會員國基於各自的安全戰略考量，透過彼此在核心利益的妥協與政治角力，形塑歐洲安全政策合作的方向與模式。^{⑥1}因此，歐洲仍持續支持現存全球體系，以及在政治、經濟與軍事各面向上所彰顯的「美國模式」。^{⑥2}在受到無法預判與解釋後冷戰時期歐洲安全的批判後，現實主義者反駁，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在歐洲的傳統軍事霸權雖未弱化，但因歐洲視美國為良善

註⑤4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 166.

註⑤5 Christopher Layne,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13.

註⑤6 Stephen M. Walt, *Revolution an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

註⑤7 Stephen M. Walt, *Taming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5), p. 72.

註⑤8 Robert J. Art, "Europe Hedges Its Security Bets,"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00.

註⑤9 Robert J. Lieber, *The American Era: Power and 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92.

註⑥0 張惠玲，「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運作理論與發展」，*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11期（2000年11月），頁49-70。

註⑥1 蘇宏達，「從自由政府間主義解析里斯本條約的發展過程」，*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38。

註⑥2 Birthe Hansen, *Unipolarity and the Middle East* (Richmond: Curzon, 2000), p. 21.

的強權，兩者得以形成「分工 (division of labor)」，歐洲擔負起區域衝突的低層次與低強度的軍事行動。歐洲內部集體軍事合作的興起，並非歐洲有意形成對美國的均衡，而是美國重新定義其在歐洲的實質利益，以及相對應的方式。總而言之，現實主義並未承認其平衡理論的限制性，而是強調歐洲安全本質的徹底改變。

二、制度主義

另一個重要的國際關係主流理論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相對於聚焦在個別國家權力與利益的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較不強調單元獨立的行動與選擇的自由，而是著重在國際機制對於會員國的影響，其目的在於追求與維持組織的穩定。^⑬同時，相較於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雖也認為在一個無政府的國際秩序當中，國際體系的基本單元以理性態度做為拓展利益的基礎，因此國際政治的競爭性質或為事實，但制度主義更強調相互合作的需要。

體系與單元之間的互動模式關係著機制的穩定性，亦是機制續存與發展的關鍵。機制的運作形成會員之間可以接受與操作的規範與行為模式，使得各自的政策與偏好，得以融合成集體的決策與對外力量。經由長期的運作過程，組織藉由正向回饋的強化作用以產生「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使得組織成員容易依照以往的習慣而採取類似的作為，因而確保組織的穩定。^⑭相對地，組織成員在機制體系當中投入相當的時間與資源，並因維護現存機制的安排因而得以持續既得利益。不同成員間可能對於機制內不同「路徑」存有歧見，但當某些路徑被證實優於其他路徑時，成員們會擱置歧見而共同遵循固定路徑。^⑮因此，機制的結構性因素較個別能動體，更能有效解釋機制的變遷與適應。除個別單元外，機制之下又可能產生次級團體，再加上機制與其他機制間產生的互動關係，因而強化了單元相互之間在各次級團體與層次間的競合關係，進一步提升關係網絡的緊密性。

一般而言，國家間的合作較容易凸顯在經濟與貿易的互賴關係上，因為各方容易因而獲致較可測量的利益，促使這些國家習慣於合作的關係，因而致力於維持而非破壞現狀。^⑯相對而言，建制的建立在安全面向上則較為困難，因為各國在軍事政策上具有高度競爭性，且國家所有或所需的安全程度，難以衡量，這些因素使得安全面向建制的建立有其先天上的難度。^⑰

雖然機制追求組織的穩定性，但是當組織遭遇到攸關存廢的不確定因素，能否進

註 ⑬ Robert C. Lieberman, "Idea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Order: Explaining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 No. 4 (December 2002), pp. 697-712.

註 ⑭ P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e 2000), p. 255.

註 ⑮ G. John Ikenber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8-1999), pp. 43-78.

註 ⑯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1.

註 ⑰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p. 357-378.

行調適以度過難關，是制度主義另一個關切的議題。機制在長期運作後已習慣於固定的運作模式，各單元亦已形塑出固定的偏好與關切，因此非經歷特殊因素，不易對機制的變革產生共識。但當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時，機制內便容易形成改革的動力。例如，組織在面對原始目的消失時必須採取是否終結的決定，成員可能考慮另組類似的機制以因應新的環境，但由於重新設立新組織的「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過高，因而可能傾向維持現存的機制，使得組織得以獲致永續發展的機會。具永續性的組織較有能力採取具戰略與長期的作法，以便設定任務的優先性，以及履行其義務與使命。^⑧

傾向於自由主義的新功能主義除了關切國際機制對個別單位的影響之外，更進一步將焦點放在機制架構下的統合進程。新功能主義者認為，概念化的統合觀是由國際組織中利益政治的制度化所形成，參與的成員試圖達成集體的目標或解決相互間的歧異，在過程中由某一領域的合作擴散至其他領域，尤其是從經濟與貨幣領域先開始，被稱為「溢出效果 (spill-over effects)」。^⑨新功能主義強調，區域統合的「溢出效果」未必符合經濟決定論，「溢出」不必然自然地擴散至軍事政策。^⑩但如果決策者或利益團體對於軍事政策整合具有強烈的推動意願，則區域的統合有可能從經濟、政治領域，擴散至安全與軍事。^⑪因此，國家間可藉由合作建立特定的國際規範、規則與機制，藉此建構「安全建制 (security regime)」。^⑫

以制度主義來檢驗歐洲安全，跨大西洋的歐洲與美國之間的安全互動早已跨越了權力政治的階段，進入一個類似威爾森式 (Wilsonian) 的自由主義，安全的關係可由民主、機制化與高度互賴做為象徵。^⑬另外，在歐洲內部，國家之間在機制之下經由在眾多政策長期的經驗與習慣，形成合作的文化，並將整合範圍逐漸推展至對外與安全的領域，強化了歐洲內部在相關政策的合作關係。當歐盟的經濟與貨幣政策的統合已獲致相當成效後，聯盟即從事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合作。^⑭另一方面，當歐洲統合遇到瓶頸時，可能是因為原本制度的設計已不符發展所需，而必須改革機制或改善決策程序，以妥善管理危機。其結果是，歐洲在面對危機或瓶頸時，反而提供了促成進一步統合的契機。^⑮

註⑧ Anand Menon and Jennifer Welsh, "Understanding NATO's Sustainability: The Limits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7, No. 1 (January-March 2011), pp. 81-82.

註⑨ Philippe C. Schmitter, "Ernst B. Haas and the Legacy of Neofunction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2, No. 2 (April 2005), pp. 255-272.

註⑩ Richard Medley, "Europe's Next Big Idea: Strategy and Economics Point to a European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 18-22.

註⑪ Gediminas Vitkus, "Changing Security Regime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NATO Euro-Atlantic Partnership Council*, <http://www.nato.int/acad/fellow/99-01/Vitkus.pdf>. Accessed on March 25, 2015.

註⑫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p. 23-27.

註⑬ Hylke Dijkstra, *Policy-Making in EU Security and Defense: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註⑭ 例如，歐元區所發生的財政危機，正是因為歐盟機制的缺陷所致，因此歐盟必須朝向以建立政治聯盟為目標，來提供長期的解決之道。Nicolas Berggruen and Nathan Gardels, "The Next Europe: Toward a Federal Un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4 (July/August 2013), pp. 134-142.

另外，制度主義者對後冷戰時期北約的前景與發展提出更多論述。^⑥制度主義試圖解釋，為何在主要威脅消失後，北約不但未如現實主義論述所預期的走向衰亡，甚至經歷了「復興 (renaissance)」。^⑦雖然機制創立的原始目標業已消失，有關敵人與威脅的概念亦已產生重大變化，但由於內部與外部的動機因素，使得北約成員逐漸發展出機制續存的共識。事實上，北約在長期不斷的演進過程中，早已發展出超越原始目標的多元功能，並隨之產生相對應的多元規則與實踐模式，因此當面對巨大變化時，相較於其他只為解決單一問題所設計的機制，北約更能有效適應高度變遷的環境。^⑧除了內外多元功能外，機制內的決策運作模式也是北約得以續存的另一主因。北約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內部決策模式與溝通方式，促使成員國習慣以共享價值的訴求來尋求共識。依照制度主義的論述，當處理共同的安全威脅議題時，機制內的會員已養成廣泛諮商的習慣，經由程序規則 (procedural rule)、討價還價 (bargaining)、不對稱權力 (unequal power) 等方式來協調會員間的歧見，以便對內外環境的挑戰有所因應。另一方面，機制也可能遇到合作的困境，會員國雖然對共同威脅採取行動具有共識，但論及各自付出時，卻多所保留，甚至產生「搭便車 (free riding)」的情形，此時機制便需制定明確的遊戲規則，促使成員們提出承諾保證並加以實踐。^⑨

北約採取迥異於以往的作為以因應後冷戰時期新的地緣政治環境，藉此彰顯機制續存的必要性，在這些作為中，最主要的當屬北約向前敵對陣營擴張，以及在會員國領土以外所進行的「境外 (out-of-area)」軍事行動。為了應對原共黨集團國家要求加入的期待，北約逐漸向中東歐國家擴張，雖然會員國的擴張增加了各單元間的偏好異質性，因而增添改革的不確定性，然而，由於新舊會員國針對改革機制功能性的強烈需求，以及機制內部漸進式的改革，使得北約逐漸發展成為更能適應後冷戰時期變遷環境的安全機制。

在實際軍事行為方面，就在冷戰正式終結之後，北約於 1991 年制定「新戰略概念 (New Strategic Concept)」文件，強調北約面臨的風險是多面向與多方向的，較冷戰時期更難以預期與測量。發生在 1990 年代初的巴爾幹半島衝突促使北約採取行動，先是武器禁運，隨之由聯合國授權實施非航區禁令，更於 1999 年在無聯合國授權的情形下，在科索夫展開軍事行動，北約的危機管理角色因而確立。更為關鍵的作為是境外

註⑥ 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3 (Summer 1996), pp. 445-475;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4 (Autumn 2000), pp. 705-735.

註⑦ Zoltan Barany and Robert Rauchhaus, "Explaining NATO's Resilience: 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Useful?,"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2, No. 2 (August 2011), pp. 286-307.

註⑧ Celeste A. Wallander and Robert O. Keohane, "Risk, Threat,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Helga Haftendorn, R. O. Keohane and C. A. Wallander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4-35.

註⑨ Wolfgang Wagner, "Why the EU'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Will Remain Intergovernmental: A Rationalist Institutional Choice Analysis of European Crisis Management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0, No. 4 (August 2003), pp. 576-595.

軍事行動，依照北約憲章第 5 條，其傳統的軍事任務使命應限於集體防衛，亦即任何軍事行動應針對直接對會員國造成威脅的對象。北約在後冷戰時期是否應進行境外行動，引起廣泛的討論。然而，史無前例突發事件的發展不但提供北約改變傳統任務的空間，也促使某些會員國的安全政策改弦易轍，美國遭受恐怖攻擊使得北約會員國決定參與在阿富汗的境外任務，連長期堅持不對外用兵的德國，都派遣駐軍。北約在阿國的任務一開始聚焦於反恐，但後來更擴展到組織型犯罪與毒品，因而其使命也從單純的軍事任務延伸到對於平民的援助。到了 2010 年時，總共有高達 14 萬軍事人員是在北約的架構下在阿富汗執行任務。另外，北約自 2008 年開始，在東非海域執行反海盜的任務。在 2011 年時，北約執行了一項更具爭議性的任務，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北約進行對利比亞的人道救援，但北約後來將任務性質擴張成爲推翻格達費政權，明顯與聯合國授權不同，引發其軍事行動是否符合國際法的爭議，但無論如何，這項較具強度的軍事任務象徵著北約對於其任務性質轉變的認知。^⑩從上述各項任務的變遷來看，北約藉由在後冷戰時期其性質的實質轉變，從事包含集體防衛、危機管理與集體安全等任務，以充分凸顯機制續存的意義。

總體而言，制度主義對於後冷戰時期歐洲安全的實際發展提供具說服力的論述，但亦不乏解釋上的困境。自由主義較缺乏如何解釋北約與歐盟在安全政策「分工」的合理性。依照自由主義的論述，北約做爲完整的歐洲安全政策機制，已足以負擔區域安全的責任，具有與北約會員高度重疊性的歐盟，似無須將整合範疇擴張至安全面向，因此不應發展出專屬歐盟的軍事防衛計畫。另一方面，制度主義過於強調國際建制對於類似歐盟與北約政策整合的決定性，忽略國內因素與超國家機制間的關係。^⑪另外，新制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類似，均強調國際社會的無政府形態，個別國家仍著重權力與利益的追求，但新制度主義只聚焦於國際層次，無法解釋國家與跨國界政策形塑的經過。^⑫

三、建構主義

相較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建構主義試圖對於歐洲在軍事政策的合作，提供更多元與有效的理論背景。^⑬歐洲安全在整體區域安全的特殊性，並非特別著重在權力與

註^⑩ 有關北約在利比亞軍事作爲的國際法爭論，參看 Geir Ulfstein and Hege Føsum Christiansen, "The Legality of the NATO Bombing in Libya,"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62, No. 1 (January 2013), pp. 159-171. 另外亦有從定義較爲寬廣的「國際人道法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HL)」精神探討北約軍事行動，參看 Peter M. Olson, "A NATO Perspective on Applicability and Application of IHL to Multinational Forc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5, No. 891-892 (December 2013), pp. 653-657.

註^⑪ 盧倩儀，「審議式超國家主義」，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6 期 (2004 年 11-12 月)，頁 53-71。

註^⑫ Giovanna Bono,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he Nice Summit and Hot Issues," *BITS*, <http://www.bits.de/CESD-PA/esdp02.pdf>. Accessed on February 16, 2015.

註^⑬ Steve Smith,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Morten Kelstrup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ower, Security and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51.

利益的平衡上，而在於觀念構成領域的明顯變遷。觀念連結在物質的結構當中，例如國家與國際建制，反應與複製權力間的關係。⁸³在傳統歐洲安全的建構過程當中，美國象徵一個形塑包括民主、市場經濟與多邊機制等觀念的「載具」；相對而言，北約與歐盟則是蘊含了觀念的「容器」，以便將觀念加以解釋與對外投射成適合國際行為的規範。觀念與規範對內部的會員國與期待加入的國家，提供足以促進歐洲安全治理的發展模式，對外則形成做為國際社會化能動體（agency）的能力。⁸⁴然而，儘管角色之間或許擁有共享的觀念，但雙方對於如何達成觀念與規範的行為模式，也可能存有競爭關係，如此可解釋為何歐洲安全具有跨大西洋模式與歐洲模式之分，此般區分在後冷戰期間較冷戰時期更為明顯。歐洲對於區域安全發展的歧見，是經由不斷論述的過程，至於論述重點並非歐洲安全本身的存廢問題，而是達成區域安全的不同手段。⁸⁵

相對而言，權力與利益均衡狀態的維持通常較為穩定，但觀念的演變則較為流動。為能有效面對與適應新的安全環境，相關角色必須重新建構觀念以做為因應。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歐洲安全在後冷戰時期的發展就是一個觀念建構與重建構的過程。從冷戰結束之初北約仍強調本身是歐洲集體防衛最為重要的平台，但後冷戰時期的歐洲缺乏明顯的外來威脅，使得北約必須將重心轉移到對共享價值與共同戰略目標的追求。對於北約而言，這是一個決定能否將任務擴大，否則此一機制便面臨終結的關鍵。⁸⁶北約的不斷擴張，是此機制在面對後冷戰歐洲高度不確定性時，所做出最為明顯的觀念變遷。從現實的實踐角度來看，北約擴張無法避免組織過於龐大，影響決策品質與效率等問題。但冷戰結束以後歐洲安全的論述發展，即強調共享價值的重要性，並在北約機制上增加了歐洲的特色，淡化了跨大西洋的色彩，使得北約做為歐洲安全機制的特質更為顯著。⁸⁷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不再只是一個單純提供安全公有財的軍事聯盟，北約已轉化為象徵自由價值與規範的國際共同體。⁸⁸

歐盟在軍事政策的統合，也類似後冷戰時期的北約，以共享價值與觀念的建構，先行整合內部的歧見，之後再循序漸進擴張至原本敵對的陣營，使得歐盟的安全政策

註⁸³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77-180; Andreas Bieler, "Questioning Cognitivism and Constructivism in IR Theory: Reflections on the Material Structure of Ideas," *Politics*, Vol. 21, No. 2 (May 2001), pp. 93-100.

註⁸⁴ Frank Schimmelfennig, "International Socialisation in the New Europe: Rational Ac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1 (March 2000), pp. 109-139. 有關歐盟擴張的「社會化」影響，見陳勁，「歐洲聯盟東向擴張的程序、挑戰與前景」，*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10期（1998年10月），頁37-52。

註⁸⁵ Mark Webber, Stuart Croft, Jolyon Howorth, Terry Terriff and Elke Krahnemann, "The Governance of European Security," pp. 7-8.

註⁸⁶ Ronald D. Asmus, *Opening NATO's Door: How the Alliance Remade Itself for a New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3.

註⁸⁷ Anthony Forster and William Wallace, "What is NATO For?," *Survival*, Vol. 43, No. 4 (Winter 2001-2002), p. 117.

註⁸⁸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Winter/Spring 1998-1999), p. 213.

成爲內部社會化與外部提升其規範特色的平台。藉由相關政策的整合，歐盟逐漸發展出由主要角色與社會團體所共享且具認同基礎的規範、觀念與習慣，並因而衍生出一套戰略文化，以便聯盟更易於達成其安全與防衛的目標。歐盟新生的戰略文化賦予聯盟在使用軍事力量以執行任務或解決爭端時，得以共同遵守的思維與行爲模式。⁸⁸事實上，從英國與法國這兩大歐洲軍事強權於1998年聖馬洛高峰會（St. Malo Summit）倡議歐盟需在軍事政策更加合作以來，歐盟已在「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里斯本條約已重新命名爲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的架構下，就軍事政策的概念、機制與對外軍事干預行動上，大幅且快速地強化會員國間在安全與軍事政策的整合。如此的合作促使歐盟在安全的領域上，爲了達成政治目的而同時使用軍事與非軍事工具，因而建構出一套共享的觀念、願景、期待與習慣行爲的共同模式。⁸⁹當歐盟的安全觀念獲致重新的建構，逐漸衍生出屬於歐盟自身的戰略文化，聯盟的本質也因之改變。

肆、全球體系的論述

一、戰略多極 vs. 規範多極

冷戰的結束帶來國際體系的轉移，但就在世界方進入21世紀之初，以美國爲主導的國際單極秩序似乎即受到挑戰。從全球經貿體系來看，大型開發中國家在國際經貿組織的發言權日增，這些國家已占了四分之三的全球外匯存底；在國際外交場合上，西方已無法主導全球事務的走向，在面對類似緬甸、朝鮮半島、伊朗、科索夫、蘇丹問題，以及討論類似防止核擴散條約、氣候變遷等國際議題時，能影響甚至主導國際輿論的，反而爲大型開發中國家，其中尤以中國的快速興起最引起全球的注目。依照各方目前發展的趨勢，至2020年時美國、中國與歐盟將各占全球總體國內生產毛額的二成。除了這些主要經濟體外，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大國，對全球事務的影響力也會逐漸增加。總之，一個全球多極體系似乎正逐漸成形。

在朝向國際多極秩序的過程中，可能產生所謂「戰略多極（strategic multipolarity）」與「規範多極（normative multipolarity）」兩種不同類型。⁹⁰戰略多極與物質權力的分配息息相關，一個強權能否成爲其中一極取決於其經濟與軍事的能力，

註⁸⁸ Christoph O. Meyer, "The Purpose and Pitfalls of Constructivist Forecasting: Insights from Strategic Culture Research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Evolution as a Military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3 (September 2011), pp. 669-690.

註⁸⁹ Alessia Biava, "The Emergence of a Strategic Culture within the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6, No. 1 (February 2011), pp. 41-58.

註⁹⁰ Amitav Acharya,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a Multipolar World? The European Un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riefing Papers*,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ez/global/50101.pdf>. Accessed on January 24, 2015.

因此追求戰略多極的強權重視的是權力平衡，使用的方式則是軟硬實力的兼顧，特別針對較為弱勢的國家做為爭取或脅迫結盟的對象，以擴大此一強權的勢力範圍。相對地，規範多極的追求依賴觀念的倡議，例如主張依據國際法與國際建制做為爭端解決與促進合作的平台，並強調以軟實力做為形塑合作安全原則與機制的工具，經由共享規則與規範連結弱勢國家，以建構集體認同。以歐盟為例，歐洲提供一個在經濟、社會與政治領域均具有吸引力的典範，使得周邊國家陸續表達加入的意願；⁹² 歐盟也在重要的國際傳統安全與新安全事務上，例如氣候變遷、人權、國際人道救援、維和任務等議題，扮演主導的角色；同時，歐盟在區域統合的優越表現，成為其他區域主義的範例。

在結盟的關係方面，戰略多極遠較規範多極容易凸顯而受到辨認，因為戰略多極呈現興起中的強權與現存霸權間的衝突，雙方可能以連結其他中小型國家做為鞏固自身實力的手段，因此全球體系更傾向於不同集團間的競爭；相對地，規範多極強調柔性訴求，吸引其他角色加入其不具排他性的機制，不會形成與現存霸權的對抗，因此以規則與規範所形成的全球多極體系較為穩定與持續。戰略多極較容易呈現的另一原因是，軍事與經濟實力得以量化，興起強權與現存霸權的相對實力消長明顯，但規範多極形成所需的實力不易測量與比較，需要較長的時間累積以凸顯其存在的事實。

在一個美國霸權不斷遭受其他角色挑戰的後冷戰時期，全球秩序是否有所轉變，以及一個興起中的國際體系究竟是偏向於戰略多極或是規範多極，都將對全球與區域的安全產生深遠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決定因素便是歐洲安全的發展。為了強化歐洲自身的全球戰略地位，歐盟特意在安全面向發展出獨立的集體能力。歐盟在軍事政策的整合，發展出以下的可能狀況。首先，歐洲安全與軍事政策強化了歐盟的集體實力，分擔美國處理區域衝突的責任，以及肩負維和與重建的任務，⁹³ 因而促使美國必須正視歐洲的特殊安全關切重點，包括歐洲對於周邊地區秩序的關注，因此歐盟將獲得更大的議程設定權，以及對於未來北約任務執行的發言權；其次，歐洲軍力的強化可能使得歐盟認為其具有完全負擔區域安全的能力，如此也同樣使得美國在決定安全政策時，必須兼顧到歐洲的態度；最後，美國對於歐盟的軍事整合可能有所疑慮，歐盟在「歐洲安全與防衛政策」的快速發展，將形成對北約的衝擊，也可能減弱美國對歐洲安全的主導性與影響力。⁹⁴

二、歐洲：規範多極的形成？

歐洲統合雖然是在冷戰兩極體系的格局中所形成，但歐盟在後冷戰時期的發展卻

註⁹² 有關歐盟認同建構的對外意涵，見王群洋，「歐洲認同與歐盟東擴之互動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37期（2012年1月），頁31-60。

註⁹³ Michael Brenner, "The CFSP Factor: A Comparison of United States and French Strategi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 No. 3 (September 2003), p. 192.

註⁹⁴ Hans-Christian Hagman, *European Crisis Management and Defence: The Search for Capabil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6.

逐漸成爲一個全球性的角色。歐盟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並且透過安全合作與共同體建構的方式成爲區域和平的重要角色，其所倡議的價值、規範、規則廣爲世人重視或接受，歐洲的文明與文化具有龐大的散播能力，況且歐洲的集體軍事力具有投射能力。雖然歐盟經常被批評爲缺乏具有可信度軍力的角色，且歐盟的會員國與機制之間在安全政策與對外行動上，必須採取政治妥協，而非面對危機時最爲需求的整體戰略評估與實質有效的解決方式，^⑤但如果考量歐盟從 1990 年代末才開始發展軍事政策的整合，卻已執行許多重要的任務，包括在剛果、印尼亞齊省、非洲查德、喬治亞、科索夫、東非外海等地，歐盟對外軍事政策的整合與實力的擴張，爲這些充滿衝突的國家或地區，帶來不同程度的安全保障。^⑥從實際的對外軍事作爲來看，歐盟在集體軍力的提升與軍事政策的整合，仍有顯著的進步。無論從整體軟實力或硬實力來看，歐盟皆具有形成全球多極體系當中一極的能力。然而歐盟仍難以在戰略多極中成爲強權，主要因爲歐盟成員的多元化與分殊性，歐洲社會內部普遍對歐盟全球角色的冷漠，使得歐盟扮演全球戰略多極體系中重要角色的能力與意願，均將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

另一方面，歐盟的價值與能力更容易在規範多極體系中加以發揮，並且以「規範強權 (normative power)」的形象在國際社會呈現。但是歐盟的規範性特色，並不只強調抽象價值，而是反映出歐洲特有的社會偏好所形成的共享利益，這些利益爲歐盟所提倡與捍衛。^⑦因此，歐洲區域安全統合所凸顯的集體實力，並不局限在傳統軍事安全的嚇阻力量，而是藉由綜合實力的提升以及價值與規範的推動，所形成得以防制其他角色使用軍事力量所造成毀滅性後果的能力，或是執行低強度軍事行動，如戰後的國家重建、維和任務、防止海盜等。事實上，歐盟在全球安全最得以扮演突出角色的一個面向是境外的任務，包括維和、人道援助與危機處理。^⑧歐盟在其他地區可以扮演中立角色，因爲歐盟不具有全球戰略強權的野心，尤其在某些地區當當地霸權不足以爲其他國家所信任時，歐盟的介入有助於區域安定，因爲除了軍事人員外，歐盟提供了更多的警務、司法、海關，以及其他非軍事的專業人員。^⑨歐盟所突出的民主與良善治理等普世價值與規範，跨越傳統主權堅持的不干涉主義的障礙，提供其他地區在處理跨邊界衝突與解決時的選項，也提高了歐盟與其他地區在發展人類安全與人道救援，以及提倡永續發展方面建立夥伴關係的機會。^⑩

註⑤ Oya Dursun-Ozkanca and Antoine Vandemoortel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ecurity Sector Reform: Current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of Implementation," *European Security*, Vol. 21, No. 2 (June 2012), p. 154.

註⑥ Roy H. Ginsberg and Susan E. Penksa, *The European Union in Global Security: The Politics of Impac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 236.

註⑦ Zaki Laidi, *Norms Over Force: The Enigma of European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3-6.

註⑧ 藍玉春，「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之制度建構與人道救援之行動實踐」，*全球政治評論*，第 32 期（2010 年 10 月），頁 77-96。

註⑨ 有關歐盟非軍事集體能力之建構，見張嘉斌，「論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非軍事工具之建構與發展」，*歐洲國際評論*，第 3 期（2007 年 7 月），頁 45-74。

註⑩ Amitav Acharya, "Regionalism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Sovereignty, Autonomy, Identity," in Shaun Breslin, Christopher W. Hughes, Nicola Philips and Ben Rosamond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20-32.

綜合而言，歐洲安全的重要性不在於成爲全球多極體系中的戰略強權，因爲後冷戰時期的歐洲無意成爲全球的軍事強權。只專注於軍事作爲的強化不只會損害長期以來所形成且得來不易的內部共識與團結，也會破壞歐盟特意建構的國際社會身分認同。相對地，當後冷戰的格局逐漸演變爲美國獨霸所可能採取的單邊主義，以及新興戰略強權對於以美國爲主導的國際單極體系的挑戰，歐洲的角色益形重要。歐盟雖無意亦無法形成另一個戰略強權以平衡其他角色，美國的獨霸也不至於對歐洲形成實質的威脅，但歐盟仍然發展出安全政策的整合與集體軍力的提升，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美國模式以外，另一個解決全球與區域衝突的方式。在後冷戰時期歐盟已逐漸擺脫以往所採取的戰略模糊性，強調安全與外交政策的獨立性，以便在國際社會朝向多極體系所衍生的高度不確定當中，能夠找尋適切的地位。^⑩同樣重要的是，歐盟可以彰顯自身的規範特質，發揮軍事以外的實力，建構一個以歐盟爲核心，且強調以法治爲基礎與以國際多邊機制爲平台的全球規範多極體系。對於歐盟而言，一個以價值與規範做爲平衡硬實力的國際秩序，應較一個興起中的區域與全球戰略多極更爲穩定。

另一方面，一個講求價值與規範的歐盟，未必不會在軍事層面的硬實力上持續強化的過程。歐盟面對一個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其內部雖然獲得高度的穩定，但也必須顧及周邊環境與全球的安全威脅。未來包括某些國家內部的種族間衝突、俄羅斯對周邊國家造成的潛在威脅、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國際恐怖主義、非傳統安全威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對歐洲能源安全意涵等等問題，都將迫使歐洲採取更爲積極的手段。尤其當美國的軍力過於擴張，美國將亞洲與中東置於對外政策的優先順序，而對於北非、巴爾幹半島以及介於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國家等歐洲周邊地區，美國介入的動機將逐漸減少，歐盟則必須肩負更大的任務。^⑪尤其是擔負具有軍事意涵的行動時，單純的維和任務與實際戰鬥行動間的界線逐漸模糊，爲了防止人道危機，歐盟必須以武力區隔內戰雙方，歐盟未來也有可能必須在周邊地區進行獨立的軍事行動。

傳統上，歐洲統合在經濟領域上成功的發揮了全球性的角色，歐盟的成立更使得歐洲以集體政治的角色介入全球事務，向外投射其價值與規範，而歐盟在安全政策的統合更加強化其國際的角色特質。藉由歐盟安全角色的提升，歐洲的身分認同在兩個層次上特別獲得彰顯：第一個層次是會員國層次，經由聯盟以集體方式對外呈現，歐盟安全政策的整合成爲所有會員國的「公共財（public good）」，符合各自的利益，聯盟的運作也形塑了各國共享的價值；第二個層次則是聯盟層次，各國在安全政策的合作形成全球層次的歐盟「共同之善（common good）」，歐盟藉此形塑對內與對外所需的

註⑩ Asle Toje, "The EU Security Strategy Revised: Europe Hedging Its Bets,"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5, No. 2 (May 2010), pp. 171-190.

註⑪ Daniel Keohane and Tomas Valasek, "Willing and Able? EU Defence in 2020,"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www.cer.org.uk/pdf/e_2020_844.pdf. Accessed on April 8, 2015. 有關歐盟對巴爾幹衝突的涉入，見劉書彬，「歐洲聯盟『巴爾幹政策』之研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1 期（2003 年 1-2 月），頁 47-74。

團結要素，因而深化各會員國在文化、傳統、原則與歷史的共同性。㉔歐盟唯有持續改善在安全政策上的機制間連結與能力的提升，使得歐盟形成一個有利於全球安全的角色，並依照歐盟的價值推動多邊主義與國際法治，才能在未來的多極體系中占有一席之地。㉕

伍、結 論

歐洲安全研究是整體安全領域與區域安全研究的重要一環，本文試圖以三個不同層次相關理論中的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分別檢驗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的歐洲安全演進，以探究理論的適用程度，並提供了以下重新檢視理論的機會。首先，在區域安全研究方面，理性主義著重地緣政治概念與安全外部性等物質決定因素；相對地，批判主義則強調動態的安全關係，重視共享認同的建構與區域秩序的重建。從歐洲在安全政策的統合進程來看，區域安全研究的理性主義與批判主義分別適用於兩個不同階段。冷戰時期的安全關係屬於「零和遊戲」，以地理所區分的集團間關係，呈現緊張的敵對狀態，且各自受到安全外部性的影響，因此理性主義較能解釋此一時期的區域安全關係。反觀後冷戰時期，不但此一外部化因素逐漸淡化，且整體區域的安全關係快速轉變，敵對的態勢為友善關係所取代，並進一步發展出區域特有的價值與認同，形成區域安全的範例，因此批判主義更具解釋後冷戰時期歐洲安全的能力。

其次，在國際關係理論方面，各個主流學派均試圖對冷戰終結前後歐洲安全的演變提出合理解釋。現實主義以利益與安全重新界定的方式，以因應新的安全環境；制度主義則強調北約與歐盟的高度制度化過程，以及在機制的平台上向外擴張其治理；建構主義認為深化的共享價值，以及社會化過程的確立，才是歐洲安全的重要保證。或許上述哪一個主流理論最能解釋後冷戰時期的歐洲安全，仍具有高度的爭議，但是無可否認的是，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紛紛致力於歐洲安全的研究，即可看出歐洲安全在整體區域安全理論與實踐的重要性。

至於在全球體系的理論上，以物質為驅動力量與以權力平衡為目標的國際戰略多極體系，以及以價值為導向與以軟實力為手段的規範多極體系，分別提供歐洲安全在全球體系扮演適切角色的檢驗基礎。對於冷戰結束前後的歐洲安全而言，兩個不同性質的國際多極體系或可分別解釋不同時期的區域安全關係。特別針對以歐盟為主體的歐洲安全統合，歐洲國家藉由長期以來的統合進程所產生的溢出效應，將逐漸累積的綜合集體實力，投射在周邊與其他地區，形塑足以代表歐盟整體的價值與規範，並產生對於其他角色有意模仿或加入的吸引力。事實上，歐盟在區域安全的發展對於有關

註 ㉔ Amelia Hadfield, "Foreign Policy and Dyadic Identities: The Role of the CFSP," *Geopolitics*, Vol. 11, No. 4 (September 2006), p. 693.

註 ㉕ Charles Grant and Tomas Valasek, "Preparing for the Multipolar World: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2020,"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www.cer.org.uk/pdf/783_8dec07.pdf. Accessed on April 27, 2015.

規範多極的論述，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在國際關係發展史上，不易找出類似歐盟的案例，因此全球規範多極體系論述的演進，有賴於歐盟能否持續發展出具有特殊性的模式。

經由本文在有關歐洲安全的不同層次理論的論述，無論是在區域的層次、國際關係的層次或全球的層次，歐洲安全研究均可置於這些理論的架構之下加以檢驗，並比較其解釋的效度與適用性。歐洲安全在冷戰期間的發展，均能以三個層次當中屬理性主義的理論加以解釋，而後冷戰時期歐洲國家在安全政策統合獲得較大的進展，與理論當中非理性因素較為相關。從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得以適切地解釋不同階段歐洲安全的發展特性，實可證實冷戰的結束對於歐洲安全而言，具有如同分水嶺般的決定性作用。以權力為安全關係核心的冷戰，形成長期的區域集團對抗，以及國際雙極體系，而冷戰的終結為區域秩序的重整、共享觀念與價值的建構、以軟實力做為規範傳播的工具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綜合而言，歐洲在安全政策的合作與統合為理論的辯證提供多元的選項，並提供了檢驗理論的良好範例。

*

*

*

(收件：103年7月30日，接受：104年3月25日)

Theoretical Bases for European Security Studies: Reg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System

Francis Yi-Hua K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American and European Divisi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security in both theoretical debate and policy practice has made its research a momentous model in the field of security studies.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various theoretical structures of European security by systematically examining both rationalism and non-rationalism in reg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global systems. Core issues of focus are allocated at three levels. The article applie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the volatile evolution of European security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and the post-Cold War era in order to asses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each theory involved. This cross-examination of the three-level theoretical structures suggests that developments of European security in the two eras can be better accounted by rationalism and non-rationalism, respectively. Rationalism explains that the Cold War European security was characterized by an international bipolarity where power was the core of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the two confrontational blocs. On the other hand, non-rationalism offers a better reasoning for European security unfolding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oncerning re-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rder, constitution of shared ideas and values, and employments of soft power as means of norms dissemination. In short,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security policy in Europe have perfectly provided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o academic fields of diversified accounts and research models.

Keywords: European Security, Reg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Global System, European Integration

參考文獻

- 王群洋，「歐洲認同與歐盟東擴之互動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37期（2012年1月），頁31~60。
- 何泰宇，「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之研究：以2003年剛果軍事任務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第6卷第4期（2005年10月），頁185~238。
- 吳雪鳳，「歐洲統合的地緣政治意涵」，*問題與研究*，第51卷第3期（2012年9月），頁55~86。
- 吳萬寶，「維持和平：歐安組織與北約的競爭抑或分工？」，*研究與動態*，第14期（2006年7月），頁59~88。
- 張惠玲，「歐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之運作理論與發展」，*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11期（2000年11月），頁49~70。
- 張嘉斌，「論歐洲安全暨防衛政策非軍事工具之建構與發展」，*歐洲國際評論*，第3期（2007年7月），頁45~74。
- 陳欣之，「單極體系的形成、維繫與轉換」，*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2期（2006年4月），頁111~140。
- 陳勁，「歐洲聯盟東向擴張的程序、挑戰與前景」，*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10期（1998年10月），頁37~52。
- 黃偉峰，「論歐洲化課題之各類研究取向及其限制」，*歐美研究*，第41卷第2期（2011年6月），頁393~463。
- 楊三億，「後冷戰時期中、東歐地區權力結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2期（2002年3、4月），頁89~103。
- 劉書彬，「歐洲聯盟『巴爾幹政策』之研析」，*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1期（2003年1、2月），頁47~74。
- 盧倩儀，「審議式超國家主義」，*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6期（2004年11-12月），頁53~71。
- 藍玉春，「歐盟安全暨防衛政策之制度建構與人道救援之行動實踐」，*全球政治評論*，第32期（2010年10月），頁77~96。
- 蘇宏達，「從自由政府間主義解析里斯本條約的發展過程」，*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38。
- Acharya, Amitav, "Regional Military-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Relevance and Limitations of ASEA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9, No. 1 (February 1992), pp. 7~21.
- Acharya, Amitav,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a Multipolar World? The European Un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riefing Papers*,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ez/global/50101.pdf>. Accessed on January 24, 2015.
- Acharya, Amitav, "Regionalism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Sovereignty, Autonomy,

- Identity,” in Shaun Breslin, Christopher W. Hughes, Nicola Philips and Ben Rosamond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 20~32.
- Art, Robert J., “Europe Hedges Its Security Bets,”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79~213.
- Asmus, Ronald D., *Opening NATO's Door: How the Alliance Remade Itself for a New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arany, Zoltan and Robert Rauchhaus, “Explaining NATO’s Resilience: 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Useful?,”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2, No. 2 (August 2011), pp. 286~307.
- Berggruen, Nicolas and Nathan Gardels, “The Next Europe: Toward a Federal Un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2, No. 4 (July/August 2013), pp. 134~142.
- Biava, Alessia, “The Emergence of a Strategic Culture within the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6, No. 1 (February 2011), pp. 41~58.
- Bieler, Andreas, “Questioning Cognitivism and Constructivism in IR Theory: Reflections on the Material Structure of Ideas,” *Politics*, Vol. 21, No. 2 (May 2001), pp. 93~100.
- Biscop, Sven, “Odd Couple or Dynamic Duo? The EU and Strategy in Times of Crisis,”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4, No. 3 (Fall 2009), pp. 367~384.
- Bono, Giovanna,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he Nice Summit and Hot Issues,” *BITS*, <http://www.bits.de/CESD-PA/esdp02.pdf>. Accessed on February 16, 2015.
- Brenner, Michael, “The CFSP Factor: A Comparison of United States and French Strategi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 No. 3 (September 2003), pp. 187~209.
-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2~108.
- Buzan, Barry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ijkstra, Hylke, *Policy-Making in EU Security and Defense: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Dursun-Ozkanca, Oya and Antoine Vandemoortel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ecurity Sector Reform: Current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of Implementation,” *European Security*, Vol. 21, No. 2 (June 2012), pp. 139~160.
- Farrell, Mary, “The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An Introduction,”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p. 1~20.

- Fawcett, Louise, "Regionalism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p. 21~37.
- Forsberg, Tuomas, "Integration Theories, Theory Development and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Johns Hopkins*, <http://www.jhubc.it/ecpr-porto/virtualpaperroom/137.pdf>. Accessed on April 16, 2015.
- Forster, Anthony and William Wallace, "What is NATO For?," *Survival*, Vol. 43, No. 4 (Winter 2001-2002), pp. 107~122.
- Gebhard, Carmen and Per Martin Norheim-Martinsen, "Making Sense of EU Comprehensive Security Towards Conceptual and Analytical Clarity," *European Security*, Vol. 20, No. 2 (June 2011), pp. 221~241.
-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Ginsberg, Roy H. and Susan E. Penksa, *The European Union in Global Security: The Politics of Impac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Gordon, Philip, "NATO after 11 September," *Survival*, Vol. 43, No. 4 (Winter 2001-2002), pp. 1~18.
- Grant, Charles, "Is Europe Doomed to Fail as a Power?,"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www.cer.org.uk/pdf/essay_905.pdf. Accessed on April 8, 2015.
- Grant, Charles and Tomas Valasek, "Preparing for the Multipolar World: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2020,"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www.cer.org.uk/pdf/e783_18dec07.pdf. Accessed on April 27, 2015.
- Hadfield, Amelia, "Foreign Policy and Dyadic Identities: The Role of the CFSP," *Geopolitics*, Vol. 11, No. 4 (September 2006), pp. 676~700.
- Hagman, Hans-Christian, *European Crisis Management and Defence: The Search for Capabil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ansen, Birthe, *Unipolarity and the Middle East* (Richmond: Curzon, 2000).
- Hettne, Björn,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p. 277~286.
- Hill, Christopher, "The EU's Capacity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6, No. 3 (Autumn 2001), pp. 315~333.
- Hopf, Ted,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71~200.
- Howorth, Jolyon and Anand Menon, "Still Not Pushing Back: Why the European Union Is No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3, No. 5 (October 2009), pp. 727~744.

- Howorth, Jolyo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European Defence Initiative," *Survival*, Vol. 42, No. 2 (Summer 2000), pp. 33~55.
- Hyde-Price, Adrian,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ic Culture, and the Use of Forc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3, No. 4 (January 2004), pp. 323~343.
- Ikenberry, G. John,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8-1999), pp. 43~78.
- Jervis, Rober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p. 357~378.
- Katzenstein, Peter,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elly, Robert E., "Security Theory in the 'New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9, No. 2 (Summer 2007), pp. 197~229.
- Keohane, Daniel and Tomas Valasek, "Willing and Able? EU Defence in 2020," *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 http://www.cer.org.uk/pdf/e_2020_844.pdf. Accessed on April 8, 2015.
- Krotz, Ulrich and Richard Mah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Rise of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63, No. 3 (July 2011), pp. 548~579.
- Kupchan, Charles A.,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3).
- Kurowska, Xymena, "Introduction: The Role of Theory in Research on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in Xymena Kurowska and Fabian Breuer eds., *Explaining the EU's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Theory in A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 1~15.
- Labs, Eric J., "Do Weak States Bandwag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 No. 2 (Spring 1992), pp. 383~416.
- Laidi, Zaki, *Norms over Force: The Enigma of European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Lake, David A.,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 A Systems Approach," in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9~51.
- Layne, Christopher,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 Paradoxes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3~126.
- Lemke, Douglas,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Lieber, Robert J., *The American Era: Power and 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ieberman, Robert C., "Idea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Order: Explaining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 No. 4 (December 2002), pp. 697~712.
- McCalla, Robert B.,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0, No. 3 (Summer 1996), pp. 445~475.
- Mearsheimer, Joh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 Medley, Richard, "Europe's Next Big Idea: Strategy and Economics Point to a European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 18~22.
- Menon, Anand and Jennifer Welsh, "Understanding NATO's Sustainability: The Limits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Global Governance: 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7, No. 1 (January-March 2011), pp. 81~94.
- Merlingen, Michael and Rasa Ostrauskaitv, "The OSCE: The Somewhat Different Socializing Agency," in Trine Flockhart ed., *Socializing Democratic Norm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127~146.
- Meyer, Christoph O., "The Purpose and Pitfalls of Constructivist Forecasting: Insights from Strategic Culture Research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Evolution as a Military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5, No. 3 (September 2011), pp. 669~690.
- Olson, Peter M., "A NATO Perspective on Applicability and Application of IHL to Multinational Forc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5, No. 891/892 (December 2013), pp. 653~657.
- Pape, Robert,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Summer 2005), pp. 7~45.
- Pierson, Paul,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4, No. 2 (June 2000), pp. 251~267.
- Pond, Elizabeth, "Kosovo: Catalyst for Europ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2, No. 4 (Autumn 1999), pp. 77~92.
- Posen, Barry R.,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1 (Summer 2003), pp. 5~46.
- Posen, Barry R., "European Uni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Response to Unipola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2 (April-June 2006), pp. 149~186.
- Rosato, Sebastian, "Europe's Troubles: Power Politics and the State of the European Proj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Spring 2011), pp. 45~86.
- Schimmelfennig, Frank, "International Socialisation in the New Europe: Rational Action in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6, No. 1 (March 2000), pp. 109~139.

- Schimmelfennig, Frank,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Winter/Spring, 1998-1999), pp. 198~234.
- Schmitter, Philippe C., "Ernst B. Haas and the Legacy of Neofunction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2, No. 2 (April 2005), pp. 255~272.
- Schweller, Randall L.,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Fall 2004), pp. 159~201.
- Shepherd, Alistair J. K.,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 Policy without Substanc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2, No. 1 (Spring 2003), pp. 39~63.
- SIPRI, *SIPRI Yearbook 2010: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Skidmore, David, "Understanding the Unilateralist Turn in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 No. 2 (July 2005), pp. 207~228.
- Smith, Michael H., "Taming the Elephan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American Power,"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6, No. 1 (January 2005), pp. 129~154.
- Smith, Steve,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Morten Kelstrup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ower, Security and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33~56.
- Talbot, Strobe, "From Prague to Baghdad: NATO at Risk,"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2), pp. 46~57.
- Toje, Asle, "The EU Security Strategy Revised: Europe Hedging Its Bets,"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Vol. 15, No. 2 (May 2010), pp. 171~190.
- Ulfstein, Geir and Hege Føsund Christiansen, "The Legality of the NATO Bombing in Libya,"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62, No. 1 (January 2013), pp. 159~171.
- van Ham, Peter, "Security and Culture, or, Why NATO Won't Last," *Security Dialogue*, Vol. 32, No. 4 (December 2001), pp. 393~406.
- van Ham, Peter, "The Prospects for a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Identity," *European Security*, Vol. 4, No. 4 (Winter 1995), pp. 523~545.
- Väyrynen, Raimo, "Regionalism: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March 2003), pp. 37~39.
- Vitkus, Gediminas, "Changing Security Regime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NATO Euro-Atlantic Partnership Council*, <http://www.nato.int/acad/fellow/99-01/Vitkus.pdf>. Accessed on March 25, 2015.
- Waeber, Ole, "European Security Identiti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4, No. 1 (March 1996), pp. 103~132.
- Wagner, Wolfgang, "Why the EU'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Will Remain

- Intergovernmental: A Rationalist Institutional Choice Analysis of European Crisis Management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0, No. 4 (August 2003), pp. 576~595.
- Wallander, Celeste A. and Robert O. Keohane, “Risk, Threat,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Helga Haftendorn, R. O. Keohane and C. A. Wallander eds., *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 Time and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47.
- Wallander, Celeste A.,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4 (Autumn 2000), pp. 705~735.
- Walt, Stephen M., *Revolution an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Walt, Stephen M., *Taming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5).
- Waltz, Kenneth N., “NATO Expansion: A Realist’s View,” in Robert W. Rac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p. 24~38.
- Waltz, Kenneth N.,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22~345.
- Waltz, Kenneth N.,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 pp. 44~79.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ddison-Wesley, 1979).
- Webber, Mark, Stuart Croft, Jolyon Howorth, Terry Terriff and Elke Krahnmann, “The Governance of European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0, No. 1 (January 2004), pp. 3~26.
- Webber, Mark, Terry Terriff, Jolyon Howorth and Stuart Croft, “The Common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nd the ‘Third-Country’ Issue,” *European Security*, Vol. 11, No.2 (Summer 2002), pp. 75~100.
- Wendt, Alexander, “Anarchy Is What Makes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391~425.
- Wilkie, Robert, “Fortress Europe: European Defense and the Future of the North Atlantic Alliance,” *Parameters*, Vol. 32, No. 4 (Winter 2002-2003), pp. 34~47.
- Wivel, Anders, “Balancing Against Threats or Bandwagoning with Power? Europe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after the Cold War,”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1, No. 3 (September 2008), pp. 289~305.
- Wohlforth, William C.,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8~118.